

# 中国的伊朗研究六十年<sup>\*</sup>

杨兴礼

**内容提要** 伊朗与中国代表着世界的两大文明。自古以来, 中国对波斯文明的探索没有中止过。现代中国对伊朗的了解和介绍, 在 20 世纪初期即已展开, 80 年代以来进入全面研究伊朗的高潮时期, 迄今取得的成果已超过 1 500 项, 研究机构近 50 家, 研究者达数百人, 队伍在继续扩大, 水平不断提高。回顾中国的伊朗研究, 漫漫求索路, 起步于百年前、曲折于 60 年间, 经验值得总结, 挫折让人警醒; 展望未来, 机遇和挑战催人奋进, 期待建立“伊朗学”研究体系, 整合与推动中国的伊朗研究, 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关键词** 中国 伊朗研究 “伊朗学” 发展阶段 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杨兴礼, 西南大学西亚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重庆 400715)。

## 中国的伊朗研究背景

中国的伊朗研究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伊朗的国际地位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侯赛因·尼扎姆所言: “伊朗是中东的中国。正如远东没有中国便没有政治意义, 中东没有伊朗便不会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sup>1</sup>

古代文明是中、伊两国早期交流的动力, 但是距离却成了交流的屏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中、伊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规模小、范围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限、交往方式传统且带有偶然性。虽然如此, 两国的交往依然源远流长, 代代传承, 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说: “仅仅从伊朗同中华文明之间的广泛、悠远和互动的交往而言, 就是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sup>④</sup>。

伊朗与中国一样, 具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除了自己的历史特征, 两国还具有诸多历史共性, 成为研究伊朗历史、社会、文化的学者发掘不尽的宝藏。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认为, 伊朗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1) 伊朗文化是迄今未中断文化传统的古老文化; (2) 伊朗文化比它周围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古老; (3) 历史上伊朗也面对入侵的阿拉伯人; (4) 伊朗在 16 ~ 20 世纪面对“地中海海盗民族”<sup>⑤</sup>, 这些与古老的中国及其中国文化前进的轨迹相似乃尔。他还认为, 伊朗人在思想上也与中国人相差不远。

中伊两国人民交往的直接领域是物质文明, 精神世界的交流则是伴随在物质文明交往之后的缓慢渐进过程。<sup>⅔</sup> 两国在许多领域的交流延续未断。千百年来中伊在物质、思想领域的交流为今天中国的伊朗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当代,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中伊两国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国家关系全面

<sup>\*</sup>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图资室主任成红为本文检索整理提供部分资料, 笔者在此特致感谢。

<sup>1</sup> Hossein Nazari, *Russia and Great Britain in Iran*, Tehran, Iran 1975, p. 6.

<sup>④</sup> 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87 页。

<sup>⑤</sup> [法国] 阿里·玛扎海里著; 耿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9 页。

<sup>⅔</sup> 参见彭树智著: 前引书, 第 258 页。

发展。2007年 1月 5日，胡锦涛主席接见伊朗领袖和总统特使拉里贾尼，他总结建交 35年来中伊关系“发展顺利”，指出：发展中伊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sup>1</sup>；同年 8月，胡锦涛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中伊两国元首会晤时强调：中伊之间要继续推进全面合作，尽快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对发展全面的双边关系充满信心。<sup>④</sup> 2008年，中伊两国的贸易额超过 250亿美元，伊朗成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中东承包工程最多的国家，双边文化交流不断扩展，表明了两国在全球化时代的特殊地位，以及相互认同和需求，构成了当今中国的伊朗研究的真正动力。2009年 11月 27日，中国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谴责伊朗在库姆秘密建设铀浓缩工厂的决议，不久伊朗就对此表达了“不快”。类似事态变化都为学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伊朗研究成果分析表（1911~ 2007年）单位：部（篇）

类 时 期	波斯语教学 与研究		伊朗文 学研究			伊朗政治 研究		伊朗 文化 研究	伊朗 艺术 研究	中伊关系 研究			伊朗经济 研究		伊朗历史 地理研究			伊朗宗教 研究		合计
	专 著	论 文	专 著	论 文	译 著	专 著	论 文	论 文	专 著	专 著	论 文	译 著	专 著	论 文	专 著	论 文	译 著	专 著	论 文	
1949年前	1		1	18	11	4	8			1	2				2		1	4	4	57
50年代				17	11	7	5		1	1	4		2			5	6		4	63
60年代				6	2	2	4	1	2	1		1			2	4	1			26
70年代				8	1	4	7	1	2	1	4				1	8	3		4	44
80年代	1		2	197	18	6	50	8	7	2	14		1	4	8	30	9	20	43	420
90年代	3	11	10	109	8	3	76	12	5	6	46	3	4	28	10	24	3	12	18	391
2000年 以来	2	5	3	22	13	5	237	36	30	8	81	2	1	43	16	34	9	13	38	598
小计	7	16	16	377	64	31	387	58	47	20	151	6	8	75	39	105	32	49	111	1 599

说明：“宗教研究” 49项专著中包含了 4部译著。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成红从《西亚非洲数据库》检索出中东研究论文、译文等 11 000多篇估算。

### 丰硕的研究成果

伊朗研究是中国对中东研究的重要内容，根据姚继德先生的“中国伊朗学研究论著索引”统计，<sup>④</sup> 1911~ 2007年中国的伊朗研究成果共有学术论文、著述、译著等 1 599部（篇），其中专著 217部、译著 102部、论文 1 280篇，论文、译文占同期中东研究发表论文、译文的 10%以上。<sup>⅔</sup> 这说明：一方面，中国的伊朗研究已有百年历史，当今中国的伊朗研究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即便在 1949年之前的 38年中，也有成果 57部（篇），占全部成果的 3. 56%；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伊朗学术研究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1949~ 2007年的研究成果占 96. 44%。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伊朗研究者还承担了国家、部委下达的各项研究项目，学术研究除了在基础研究方面不断进步，与国家的实际需求结合得也越来越紧密。

纵观现代中国的伊朗研究，其主要集中在：伊朗历史、宗教、核问题、能源、经济发展、文化、

<sup>1</sup>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qjg/xybfs/gjlb/1444/1446/t287139.htm>，2007年 1月 5日。  
<sup>④</sup> See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qjg/xybfs/gjlb/1444/1446/t352077.htm>，2007年 8月 16日。  
<sup>④</sup> 参见姚继德主编：《中国伊朗学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237~ 324页。该资料是迄今笔者见到的最系统的伊朗研究成果目录。但其中有些归类值得商榷。  
<sup>⅔</sup> 笔者根据成红从《西亚非洲数据库》检索出中东研究论文、译文等 11 000多篇估算。

国情、国际关系、波斯语等领域,以及对前往伊朗投资、经商、旅游等法规、资料性介绍。

从时间的演进看,中国的伊朗研究内容和深度都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1)1919~1949年:共57部(篇)成果。研究人员主要是老一辈学者。他们奠定了现代中国伊朗研究的基础,例如,1919年胡适译文《希望》刊发在《新青年》1922年郭沫若的《Rubaiyat之重译》(发表在《创造》)、1923年闻一多的《裁默伽亚谟之绝句》(刊发在《创造》)、郑振铎的《中世纪的波斯诗人》(收录在《文学大纲》之中),1927年郭沫若出版论著《波斯诗人裁默伽亚谟》和译著《鲁拜集》1928年、1929年章铁民出版译著《波斯故事》《波斯传说》等,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伍实、仲持、吴剑岚、朱湘等都是当时研究伊朗文化的主力,先后推出清野译著《波斯民间趣事集》达年译著《伊朗童话集》40年代郑杰译著《伊朗童话》王静斋译著《真境花园》从而将伊朗的诗歌、童话、故事等介绍到中国,1921年、1930年出版译著《波斯问题》(公民书局)、《战后新波斯》(民智书局)、1930年、1940年先后出版了谢兰的《新波斯》(商务印书馆)、陈坤的《新伊朗》(世界书局),介绍的是伊朗国家状况。1938年清真出版社出版了张谦的《实用波华词典》为学习波斯语、研究伊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2)1949~1979年:共133部(篇)成果,其中以20世纪50年代较多,70年代次之,60年代最少;文学类较多,历史地理类、政治类次之,中伊关系类、宗教类、艺术类、文化类、经济类较少,语言类则空白,而且,文学类、文化类、宗教类都没有专著产生,艺术类则全部是专著。应当说,这段时期对于伊朗语言类教学、推广和研究的重视不够,是对50年代基本对立、60年代开始缓和、1971年建交,然后开始较快发展、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遭受挫折的中伊关系发展轨迹的学术印证。(3)1980~2009年:中国的伊朗研究步入了快速度、大规模、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时期。研究成果1400多部(篇)<sup>1</sup>,占伊朗研究全部成果的88%以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30年、促进国际问题研究全面繁荣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和伊朗在中东以及世界的地位急剧提升、两国相互影响全面扩大的学术表现。当时中国的伊朗研究重点仍然是传统的文学、政治、文化艺术、宗教领域,语言和经济等领域依然是研究的弱项。90年代取得的研究成果共391项,其中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文学、政治领域,中伊关系研究异军突起,波斯语教学与研究、经济类专题研究成果显著增多,但是文化和艺术研究类成果数量变化则不大。这是因为,90年代,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世界诸强的关系趋于明朗和稳定,中国也希望能够充分开发利用好伊朗的市场和资源、化解西方对中国施加的大周边压力,特别是在中国逐渐明确并实施“外向型能源战略”、“外向型资源战略”、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的背景下,中伊关系不断深化,较多中国企业开始进入伊朗、走向世界,中伊关系的特征与发展规律、两国的经贸合作成为研究重点就是顺理成章之事。21世纪初,中国的伊朗研究成果比20世纪90年代又增加了200多项,共598项(不含2008及其以后的成果)。其中,关于伊朗政治和中伊关系研究类成果数量分别升至前两位,此时期最显著的变化是:伊朗文学类研究成果迅速下降,波斯语教学研究成果仍处末尾。研究成果的这种变化,与中国、伊朗国内外局势变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战争、特别是2003年伊朗核计划曝光,以及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国际石油危机再次逼近等重大事件的相继发生,美国“帮助”伊朗打败了竞争对手伊拉克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国际油价不断攀升也增强了伊朗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伊朗逐渐从边缘进入中东甚至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的焦点;新世纪的中国,稳步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并向着世界强国的目标挺进。同时,中国仍然面临国际势力的围堵遏制,经济持续发展需要稳定的能源、资源供给和更加广阔的市场的挑战,这些使得中国更加重视伊朗,伊朗也需要中国

<sup>1</sup> 笔者引用的统计数据与《西亚非洲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比有一定出入(后两者认为有关伊朗问题的学术文章有近1000篇,其中“政治、宗教问题”200多篇;“外交问题”近500篇;“经济问题”130多篇;“历史文化问题”60多篇;“军事问题”50多篇)。

的支持,中伊对对方各有所求,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下的交往越来越多、范围渐趋广阔,但是中国在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回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种剧烈变化的世界新格局,促使中国学者对伊朗行为的世界影响及其对中国、对中伊关系变化的影响的高度关注,尤其伊朗核问题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与重大研究问题。

## 发展中的伊朗研究机构

据了解,当代中国研究伊朗的学术机构主要分布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高校系统、新闻机构系统,以及政府研究部门中,其中最早成立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原名亚非研究所,1961年7月4日建立),1964年,相继成立了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宗教研究所、云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它们成为中国较早研究伊朗的学术机构。此外,目前与伊朗研究有关的中国学术研究机构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其前身为中东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东南亚研究所)、西南大学西亚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欧亚研究所、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宁夏大学回族研究所、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国防大学、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等(因为4家“伊朗研究中心”都各自挂靠于高校,故未单独统计),共同构成了当今中国的伊朗研究机构的主体,它们同时又是中国研究中东的主要学术机构。特别要提及的是,1978年成立的中国中东学会作为全国性的中东研究团体,对中国的伊朗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2005年以来,中国的伊朗研究机构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西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西南大学先后成立了“伊朗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伊朗文化研究所等,共同形成中东研究系统下的专门化伊朗研究机构。这种变化可能预示着中国中东研究学术机构的进一步专业化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在波斯语教研领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新疆大学等高校是主力军。2005年3月7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鸿年、曾延生、叶奕良三位学者获得了北大伊朗文化研究所授予的“杰出贡献奖”、伊朗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授予的“终身成就奖”和德黑兰大学专门为有突出成就的国内外学者设立的纪念奖章,2005年11月,叶奕良教授进入伊朗“名人堂”,这表明了北京大学及中国学界在波斯语教学和研究、伊朗文化研究和传播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学术刊物是展示学术(论文)成果的主要平台。1000多篇伊朗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国的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数百种刊物杂志上。其中,《西亚非洲》自1980年创刊以来,就成为发表中国的伊朗研究学术论文的主要阵地,据笔者粗略统计,1980~2009年第11期的《西亚非洲》,共刊载有关伊朗政治、经济、宗教、历史,以及中伊关系的学术论文58篇;《世界知识》杂志在1941~1989年间刊载的有关伊朗的政治类文章42篇,成为当时发表伊朗学术论文的主要刊物,1990~2007年在《世界知识》上发表的文章也有20多篇。《国际展望》、《瞭望》、《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宗教研究》等刊物也是发表伊朗研究成果的重要渠道。

## 关于发展中国伊朗学研究的思考

2003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中东学术会议上几乎都讨论了伊朗核问题,2009年5月8~10日,在河南师范大学举行了全国伊朗问题学术研讨会,说明中国中东学界对伊朗研究的日益重视,也表明伊朗

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近年来，中国学者认为应当系统地研究伊朗，因此，提出了关于研究“从古至今诞生在伊朗大地上的所有文明形态”的“伊朗学”的问题。<sup>1</sup> 这种研究范畴不能仅限于当前的伊朗国界，姚继德先生借用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关于“伊朗学”的界定：“伊朗学是一门研究伊朗这方土地上的文明、文化和历史诸领域的科学……伊朗学实际上是学问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伊朗学是一个综合而多维的概念，是一种……理论方法”<sup>④</sup>。这样的学术概括对伊朗研究有了一个总体框架，哈塔米先生出于对自己国家悠久灿烂文化的热爱和发扬光大，强调要“关注‘地理学上的伊朗’、‘历史学上的伊朗’和‘语言学上的伊朗’”，不能将伊朗文明的研究视野局限在今天的伊朗地理边界，他把伊朗学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导向了古今和世界。

笔者认为，按照“伊朗学”是传统的（古典的）东方学下的古老学科，又跨越了自古至今的时空维度，包含了所有与古代波斯文明和当代伊朗内政外交的综合性大学科<sup>⑤</sup>的认识，我们可以将以上中国的伊朗研究归总到“伊朗学”领域中去。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可以发现，当今中国的“伊朗学”已具备雏形，在历史、宗教等领域进展比较快，而在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等领域还显得迟缓和薄弱。因而，中国的“伊朗学”正处于整合、成长的大好时机。

“伊朗学”概念既非今日提出、也非应一日之景，应当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伊朗学”。哈塔米的认识有合理之处，可以作为中国的伊朗研究发展之参考，今后需要在以下方面予以特别关注：（1）重视基础研究，对伊朗国情、政情研究欲与伊朗的发展现实相一致，这就需要学界从基础学问的研究入手，夯实研究根基；（2）学术研究既紧跟形势，又不能为形势所左右；（3）研究方法应有所突破，我们必须承认，伊朗研究大多属于人文科学范畴，传统研究方法仍然是基本研究方法，但它应与伊朗相关学术机构、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建立联系；还应当不定期地到伊朗实地考察、生活，接触真实的伊朗；研究手段可以借鉴自然科学和理工科的某些研究方法；（4）国内研究机构的整合、交流、沟通应当进一步加强，在资料共享、人员（语言）培养、定向服务等方面深化合作；（5）研究领域可以分工、侧重，在此基础上交叉研究内容；（6）与中东学、国际关系学、世界经济学、世界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起来，横向引进和扩散。从学术研究和学术积淀的深度看，笔者认为，中国的伊朗研究仍很年轻，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成 红）

<sup>1</sup> 参见姚继德：《伊朗学的由来及其研究范围》，载姚继德主编：前引书，第23页、28页。

<sup>④</sup> 同上。

<sup>⑤</sup> 同上。

## Study o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g Lincong

pp. 44– 47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y o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fluctuated with the change of times and it had a period of “flourish” in the beginning and a period of “standstil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redevelopmen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and now it is displaying a stage of fast development. The study o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es not only on research patterns and fields but also on formulating some viewpoints represented by Chinese scholars. Now the study o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minds such problems as unbalance of research, shortage of original research, and the system and theory of the discipline are in process of formation.

## Jewish Study in China

Xu Xin

pp. 54– 58

For Chinese study on Jew, 1949– 1978 was a period of standstill.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the study on Jew began to revive and develop a new stage. Some profess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es were set up, large numbers of books and papers on Jew were published, and lessons on Jew history and culture activated in universitie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exchanges flourished, those gave a great push to promote Chinese study on Jew.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udy on Jew will help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Middle East issue and master the identity of the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 will also promote the study on the life and the Diaspora History of Jew in China.

## Sixty-year Study on Iran in China

Yang Xingli

pp. 63– 67

Iran, located in the western section of the Asian continent, and China, located in the east coast of Asia, represent two grea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Although obstructed by a considerable geographical distance and restrained by the times, China's exploration on the Persian civilization has never been stopped. China started its contemporary probe and introduction to Ir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entered a flourishing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study on Iran in the 1980s. Up till now, there have been over 1,500 fruitful researches, around 50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hundreds

of research scholars, with the scope expanding and the research level advanci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search on Iran, this long arduous road was built a hundred years ago and has encountered twist and turn during the 60 years, bringing with it both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alerting frustration.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w century, which is full of encouraging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is hoped that a specific research system such as “Iranology”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integrate and foster China's researches on Iran, and to bring these researches to a new height.